

进化心理学视角中的腐败行为及心理机制*

任亮宝^{1,2}, 田 芊¹, 孙时进¹

(1.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上海 200433; 2. 河西学院, 张掖 734000)

摘 要: 腐败作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不同领域学者针对腐败行为产生原因与对策进行探讨。普遍认为制度、权力、文化等因素是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个别研究涉及到腐败主体的内在心理。进化心理学从进化和适应的视角对人类行为发生及心理内在特征具有终极解释度。因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独特视角, 从个体生命史历程(如童年创伤、贫穷经历等)去揭示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关键词: 腐败行为; 进化心理学; 童年经历; 生命史策略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8)02-0104-06

1 引言

腐败作为全世界普遍的问题, 在不同国家已经存在多个世纪。Neu 等(2013)认为, 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都未能摆脱腐败的影响。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腐败同样蔓延。十八大以来, 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 在惩治腐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但腐败现象仍层出不穷。腐败不仅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Johnson et al., 2011), 也危害着社会长治久安(Gupta et al., 2002); 既减少了社会福利, 又损害着资本积累, 也导致低增长和贫穷陷阱(Angelopoulou, Philippopoulos, & Vassilatos, 2009)。因此,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不仅是国家关注的焦点, 也应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腐败本质的认识, 学者们解读各有不同。Svensson(2005)认为, 公众腐败普遍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益。Jain(2001)认为, 腐败是官员使用权力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Banerjee 等(2012)认为, 学者们对腐败本质的认识虽有所差异, 基本都包含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政府官员在公共事务中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有获得寻租的机会; 二是这些腐败行为是被政府规则所禁止。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腐败是权力的变质, 公共权力“私有化”, 其本质是权力与金钱的变换。因此, 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是腐败。因此, 理性认识腐败本质及决定因素, 以期为国家反腐能够取得根本性突破提供理论贡献。

近年来, 不同领域学者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 对腐败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探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但对于腐败行为产生的心理根源给予终极解释的研究则较少。而进化心理学能够从进化和适应视角为解释人类行为和心理内在特征提供理论支持, 认为人类祖先生存条件影响着人类心理机制的形成, 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形成适宜性的心理机制, 并且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 这为解释当前腐败行为产生原因及机制提供独特视角。因此, 本文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现有成果, 分析腐败主体童年创伤、贫穷等经历对成年后个体成长的影响, 从而揭示腐败行为产生的进化心理机制。全文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 梳理并评述现有腐败问题研究的成果; 二是,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阐释腐败问题产生的心理机制, 充实现有研究; 三是, 提出后续研究的基本设想。

2 腐败行为成因: 传统研究的视角

有效反腐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和探寻腐败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立足学科领域, 研究视角虽有不同, 但都为反腐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通过文献梳理, 目前对腐败行为产生原因及机制的探讨聚焦于以下领域。

2.1 权力与腐败行为

作为寻租理论之父, Tullock(1989)的理论经常被用来解释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认为政府通过公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创造“租金”, 给少数特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项目(16BSH090)。

通讯作者: 孙时进, E-mail: sunshijin@fudan.edu.cn。

权者“寻租”提供可能性。一般而言,寻租都是以较低成本贿赂获取较高利润,扭曲公共资源的配置。Infante 和 Smirnova(2009)认为非法寻租一般发生在无力的制度环境中。违法寻租活动就是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侵占公共财富,将其占为己有的腐败行为。反腐败要求公权力人员在公共资源配置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日渐扩张的个人欲望促使其设法通过权钱交易实现。因此,人们会决策其行为,当私利大于私人成本时,其决策结果会诱发腐败行为。Park 和 Blenkinsopp(2011)认为,透明性是抑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之一,决策中的高透明性能够增加对腐败行为检测的概率。但是,在无制约的公权力面前,腐败行为的侵略性、扩张性、劣根性无法避免。因此,公权力异化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痼疾,也是促使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民主化和新闻自由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腐败行为(Bhattacharyya & Hodler, 2015)。

2.2 文化与腐败行为

Sandholtz 和 Koetzle(2000)认为,以激励与机会的文化导向和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一个国家腐败水平。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导向、行为规范已经渗透在人类生活中,潜意识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影响个人选择。以儒家思想为文化传统的中国,强调个体之间关系和谐性,面子、人情成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而人情背后蕴含着文化价值所支持的社会规范。这使得中国社会关系出现“家族化”倾向,家族掌权者利用家族观念形成“政治关系网”,使关系腐败、政治腐败成为可能。因此,“熟人社会”的中国,遏制腐败主体社会关系“家族化”是反腐关键。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腐败程度与信任形式及道德规范相关,并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而 Xu 和 Li(2016)认为,相比西方宗教,本土宗教文化对我国反腐败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宗教道德行为比世俗道德行为更具有自律的约束性,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遏制腐败行为的出现。

2.3 社会心理与腐败行为

社会文化和环境是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行为人的心理动因才是关键。有学者认为,腐败行为除了受到体制弱点和经济压力影响外,还受到文化、社会和性格的影响,而个人态度和自我价值是抑制腐败的重要策略(Nordin, Takim, & Nawawi, 2012)。徐瑞婕等(2015)认为,“心理绑架”影响腐

败产生的重要因素,绑架者为获取某种利益,在被绑架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人情互动建立双方的联系,进而利用人情关系达到工具性目的过程。俞国良等(2016)认为,权力最初为中性,但经过当权者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权力有了积极和消极之分。权力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心理上的权力感改变了其在社会情境甚至非社会情境中的认知和行为。权力总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认为当权者的侥幸心理、心理定势和心理成瘾是导致其腐败的主要因素。因此,唤醒当权者责任意识,健全问责制度,梳理正确的自我价值,一定程度上对权力腐败具有制约作用。

3 腐败行为的根源:进化心理学的独特视角

腐败行为大多都是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等外界因素的诱发下,通过行为主体的动机最终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前文所述,不论从公共权力,还是社会文化去解释腐败行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但忽视了腐败行为主体的内在心理。社会心理视角虽然认识到认知偏差等内在心理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并未重视腐败主体生命历程在个体成长中的意义。相比而言,进化心理学侧重于对人类行为与心理本质的解释和拷问,从进化和适应的视角对人类社会行为等方面具有终极解释度。因此,从人类进化历史中探寻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入手,对腐败行为形成根源的探讨更有价值。

进化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试图从进化和适应的视角对人类行为及心理内在特征进行解释(Buss, 2007)。认为人类祖先的生存条件影响人类心理机制的形成,为了适应复杂社会环境,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宜性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保留下来。进化论认为,行为的功能是什么并不重要,其关键在于这些行为具有适应意义,达到生存和繁衍目的。

从进化心理学来看,对环境的适应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唯一来源,尽管存在基因突变的可能。基于自然选择核心地位,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人类每一特质都代表心理和行为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适应性。Buss(2011)认为,尽管人类的心理行为适应过去,但未必适应于现在,而适应于现在的心理和行为,可能要经过漫长自然选择和适应的进化过程,在遥远的未来人类身上才会出现。当前社会中的腐败行为可看作是一种“适宜性”反应,有着深刻和遥远的历史根源,是自然适应和长期进化的产物,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根除腐败的难度。

3.1 竞争与合作

进化心理学认为竞争与合作影响着人类心理和行为,即利己与利他主义对心理会产生影响。腐败行为是掌权者为满足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违反社会规范,本质上是利己主义。因此,可以从利己进化层面去探寻腐败行为产生根源。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核心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遵循“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等规律。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为了生存和繁殖,同样需要食物、配偶、住所、工具和金钱等(Gorelik, Shackelford, & Weekes - Shackelford, 2012)。腐败主体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虚伪狡诈的行为以权谋私,追求个人利益,获得更高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生存和繁衍的能力,社会地位高低体现为个人所拥有资源的多少。因此,财富获得多少就成为衡量“适者生存”的手段。

张柯(2004)认为,人类与黑猩猩有着共同祖先,通过二者行为活动的类比可发现人类行为及社会进化的轨迹,结果表明人类很多行为并没有摆脱动物进化的影响。德瓦尔(2009)认为,在族群内雄性黑猩猩会采用各种途径保护自身权力和地位,其方法与人类相近,经常会采用与其他成员结盟进而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地位,这使得人类社会发展利用“结党营私”致使集体腐败、关系腐败或政治腐败成为可能。因此,该结论为解释人类腐败行为及心理提供了进化动因。

另外,内含适应度理论认为,自然选择倾向于能促使有机体基因得以传播的特性,不管有机体是否能直接繁殖后代(Hamilton, 1964)。这为解释亲代投资和亲属照顾提供可能,也一定程度上为揭示腐败行为提供理论支持。腐败者对于资源的抢占不仅满足个人利益需要,也增加其亲代和子代适宜性。关系腐败、“家族化”腐败等行为作为一种利己主义,具有强大的亲代子代适宜性,腐蚀着社会中利他主义人群,相对降低了利他主义人群的适宜性。因此,对于腐败行为来说,也是人类生存与繁衍过程中本性行为作用的结果,同样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获得个体或物种生存的进化结果。毕九川(2014)认为,腐败行为表现为腐败主体对资源的过度占有,可能源于之前人类社会资源的稀缺。总之,权力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掌权者通过利用手

中的权力获取更多资源,进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当前社会中集体腐败也存在相对久远的进化心理机制。

3.2 性选择

依据达尔文性选择理论,Buss(2000a)认为妒忌对于爱和性来说是必要的,这为解释腐败行为中权色交易提供进化心理依据。性选择理论认为,配偶争夺竞争会影响繁殖成功率,同性为争取更多配偶而发生斗争。尚玉昌(2013)认为,在自然界大多数情况下,雄性动物发生争夺雌性的配偶争夺战。对雄性动物而言,夺得配偶多少是其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雄性动物在自然选择的支持下,通过谋权、保权,运用权力获得性和繁殖的竞争,而这种活动通过代代的重复,最终形成遗传性趋向权力的心理倾向。而雌性动物,通过“性交易”方式,从雄性那里获得一定生存资源和权力地位。因此,在腐败行为中,女性腐败者将男性腐败者当作为其获得等级地位和稀缺资源的手段,而这种权色交易的动机也就顺其自然成为腐败者权钱色交易的机会。

3.3 生命史理论

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认为,生命进化过程是把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用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终极目标上。然而,由于个人获取资源能力有限,资源本身有限,但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人类需要对有限时间、资源和能量进行权衡,并合理分配在与生存和繁衍相关的任务上,对于资源进行分配所用策略,构成生命史策略。同时,Belsky 和 Hartman(2014)认为,生命史权衡是一个熔铸于个体成长经历、经由基因和环境共同调节的动态过程。Eliss 等(2012)认为,各类生命史策略可以在从慢到快的连续体上进行评价,通常分为快慢策略。慢策略指向未来的生存投入,如更晚生育年龄以及延迟满足行为;而快策略指向当下繁殖投入,如更早生育,看重当下获利,易冲动和产生冒险行为。

进化论认为,童年经历会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生命事件出现和持续时间。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过去的经历都存在于其现实中。因此,人类现在的行为和心理不仅受到当前环境的影响,还与其童年经历有着紧密关系。Wenner 等(2013)的研究表明,生命史策略对骄傲、懒惰、暴食、愤怒、嫉妒、欲望和贪婪等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慢策略能够有效控制自己冲动思维和行为,减少不良社会行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腐败离不开腐败主体的生命史策略,

腐败行为与个体快策略的使用似乎存在着密切关系。而童年环境也影响个体生命史策略。Ellis等(2009)认为,冒险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如极端和不稳定的环境)是具有相当高的适应意义,可能是个体当下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Copping和Campbell(2015)认为,作为影响生命史策略的重要因素,童年不稳定的成长环境不仅促使个体未来产生攻击行为,还诱发其冒险和违规行为的产生,研究结论为揭示腐败行为提供实证支持。

另外,Corazzini等(2011)认为,由于资源或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使得部分人缺乏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资源,而其他人没有,会造成心理上的相对贫穷。Bosco(2016)进一步指出,长期处于贫穷环境中增加了腐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国内有学者认为,当下全民拜金和贪腐问题,既受到当下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历史和几十年前的社会状况的影响,尤其是早期童年环境和经历对当下社会心理的影响。并认为,改革开放尽管解决了物质贫困问题,使得人们富裕起来,但心理贫穷和不安全感并未自然消失,过去贫穷留下的心理创伤和不安全感仍旧严重影响着人们当下的生活和行为(孙时进,2014)。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当权者腐败行为的心理原因之一,是其童年贫穷经历给他们留下的心理创伤。

综上所述,基于进化心理学,从人类进化和适应的生命历程去考察腐败行为的根源,主要聚焦于腐败主体早年环境、经历,尤其是童年贫穷经历造成的心理创伤对当下生活和行为的影响。从进化视角来看,当前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过度占有,可以说是其早期资源过度匮乏在当下生活中的延续。因此,为了揭示腐败行为的终极原因,必须从人类长期进化和适应的生命历程中寻找行为背后的内在心理特征,这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4 未来研究展望

在梳理前人对于腐败行为产生原因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立足个体生命史历程,从人类进化与适应的视角对腐败行为及心理本质给予解释和拷问,在腐败行为形成机制方面具有终极解释度。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反腐败提供新的理论解释视角。然而,由于本身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在后续研究中得以完善。

4.1 腐败行为与实验研究

进化心理学视角着眼于腐败主体的整个生命历

程,对腐败行为产生的进化心理机制进行理论推导。然而,如仅仅基于不同理论推导分析腐败行为,显然与现实腐败大相径庭,从而陷入理论推导和实际案例不相符的困境。魏子哈等(2015)通过实验室情景模拟,利用心理学实验对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寻找腐败行为产生的因果机制。雷震等(2016)研究利用实验对腐败行为进行探讨,尽管侧重经济学分析,但为从进化视角探究腐败行为的心理机制提供方法学上指导。因此,既然进化心理学已经找到腐败行为产生的终极心理机制,如果将其理论成果与心理学实验整合起来,能为解释腐败行为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实证支持。

4.2 腐败行为与心理传记学分析

心理传记学作为质化研究的典型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着眼于对个人的生命史做发展性个案研究,或针对特定人物从事心理传记的研究。国内有学者认为,作为与人格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历史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心理传记学在研究最具创造性和复杂性的人物,从整体层面对人进行的理解上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优势(郑剑虹,2014)。其关键点在于如何从大量的传记资料中提取有用资料,其特点在于分析传记资料、突出特殊价值与心理学意义(Kováry,2011)。因此,结合进化心理学理论,以传记方式对腐败个案的家境、仕途、忏悔录等资料进行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腐败主体腐败行为的原因及其人格、心理形成与发展,研究成果为当前国家反腐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4.3 腐败行为与量表研究

腐败行为是外显的,但形成机制却是内隐。因此,借助心理学量表,间接测量其内在心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文所述,童年贫穷,尤其是童年创伤所带来的心理贫穷也是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当下生活中对金钱的过度占有其实是个体早年物质资源过度缺乏的延伸。因此,运用标准化心理贫穷感量表,对于不同年代的群体进行试测,一定程度上对行为主体腐败的可能性具有预测作用。另外,以腐败群体作为样本,依据统计结果检验腐败主体贪腐行为与心理贫穷感之间的关系大小,进一步证实心理贫穷感在导致腐败行为产生中的负面效应,从而尽早做好防腐预警工作。

参考文献

- 毕九川.(2014).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官员腐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

- 弗朗斯·德瓦尔. (2009). 黑猩猩的政治.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雷震, 田森, 等. (2016). 社会身份与腐败行为: 一个实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 (3), 869–892.
- 尚玉昌. (2013). 动物行为研究的新进展(六): 性选择和配偶选择. *自然杂志*, (3), 207–210.
- 孙时进. (2014). 物欲或拜金: 心理学视角的解读.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6), 57–60.
- 魏子晗, 詹雪梅, 孙晓敏. (2015). 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 一项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研究. *心理科学*, 38(6), 1459–1465.
- 徐瑞婕, 许燕, 等. (2015). 对腐败的“心理绑架”效应的验证性内容分析. *心理学探新*, 35(1), 35–40.
- 俞国良, 王浩. (2016). 社会转型: 反腐倡廉是一场持久的“心理战”.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06–113.
- 张柯. (2004). 从黑猩猩看人类行为演化. *森林与人类*, (10), 50–51.
- 郑剑虹. (2014). 心理传记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 *心理科学*, 37(4), 776–782.
- Angelopoulos, K., Philippopoulos, A., & Vassilatos, V. (2009). The social cost of rent seeking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3), 280–299.
- Banerjee, A. V., Mullainathan, S., & Hanna, R. (2012). Corruption. *Working Papers*, 42(1), 97–108.
- Belsky, J., & Hartman, S. (2014).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World Psychiatry*, 13(1), 87–89.
- Bhattacharyya, S., & Hodler, R. (2015). Media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13–24.
- Bosco, B. (2016). Old and new factors affecting corruption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51, 66–85.
- Buss, D. M. (2000a). *The Dangerous Passion: Why Jealousy is as necessary as Love and Sex*. New York: Free Press.
- Buss, D. M. (2007).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at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3), 502–512.
- Buss, D. M. (2011). Personality and the Adaptive Landscap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reating and Solving Social Adaptive Problems. In D. M. Buss & Hawley (Eds.), *The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pping, L. T., & Campbell, A. (2015). The environment and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Neighborhood and individual–level model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6(3), 182–190.
- Corazzini, L., Esposito, L., & Majorano, F. (2011). Exploring the absolutist vs relativist perception of poverty using a cross–country questionnaire survey. *Isla Working Papers*, 32(2), 273–283.
- Ellis, B. J., Del Giudice, M., Dishion, T. J., Figueredo, A. J., Gray, P., Griskevicius, V., & Wilson, D. S. (2012). The Evolutionary Basis of Risky Adolescent Behavior: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3), 598–623.
- Ellis, B. J., Figueredo, A. J., Brumbach, B. H., & Schlomer, G. L. (2009).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The Impact of Harsh Versus Unpredictable Environments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Human Nature*, 20, 204–268.
- Gorelik, G., Shackelford, T. K., & Weekes–Shackelford, V. A. (2012). Resource Acquisition, Violence, and 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In T. K. Shackelford & V. A. Weekes–Shackelfor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Violence, Homicide, and War* (pp. 506–52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S., Davoodi, H., & Alonso–Terme, R. (2002). 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3(1), 23–45.
-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1), 17–52.
- Infante, D., & Smirnova, J. (2009). Rent–seeking under a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conomics Letters*, 104(3), 118–121.
- Jain, A. K. (2001). Corrup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5(1), 71–121.
- Johnson, N. D., Lafountain, C. L., & Yamarik, S. (2011). Corruption is bad for growth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Choice*, 147(3–4), 377–393.
- Kováry, Z. (2011). Psychobiography as a method The revival of studying lives: New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7(4), 739–777.
- Neu, D., Everett, J., Rahaman, A. S., & Martinez, D. (2013). Accounting and networks of corruption.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 38(6–7), 505–524.
- Nordin, R. M., Takim, R., & Nawawi, A. H. (2012). Transparency initiatives (TI) in construct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uman behaviour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50(50), 350–360.
- Otusanya, O. J. (2011). Corruption as an obstacle to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14(4), 387–422.
- Park, H., & Blenkinsopp, J. (2011). The roles of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7(2), 254–274.
- Sandholtz, W., & Koetzle, W. (2000). Accounting for Corrup-

- tion; Economic Structure, Democracy,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1), 31 – 50.
- Svensson, J. (2005). Eight questions about corru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3), 19 – 42.
- Tullock, G. (1989). *Efficient Rent Seeking, Diseconomies of Scale, Public Goods, and Morality. 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 Springer Netherlands.
- Wenner, C. J., Bianchi, J., Figueredo, A. J., Rushton, J. P., & Jacobs, W. J. (2013). Life History Theory and Social Devi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telligence*, 41(2), 102 – 113.
- Xu, X., Li, Y., Liu, X., & Gan, W. (2017).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2), 34 – 49.

Corrup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Ren Liangbao^{1,2}, Tian Qian¹, Sun Shijin¹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Abstract: Corruption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many countries; scholars in different fields are discussing the causes for corrup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stitutional, power, cultural and other factors are the primary causes for corruption. Some individual researches involve the inner psychology of the subject of corrupti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ovides the ultimate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to explain human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such as childhood trauma, poverty experience, etc.).

Key words: corrupti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hildhood experience; life history strategy